英国不必急于“脱欧”

陈东海

1月23日，英国首相就英国与欧盟关系的前景发表演讲，宣称可能在2017年底之前就英国是否退出欧盟举行全民公投。如果届时英国如期举行公投并退出欧盟，那么对英国、欧盟和全球都是一件大事。

为什么卡梅隆要提出英国退出欧盟的议题，并拟订时间表？除了英国保守党内部一直存在欧洲怀疑派，还因为欧盟内部的一些政策对于英国有负面作用，未来的一些政策趋势也可能损害英国利益，例如，开征金融交易税及加强金融业监管等。其实这还只是英国想退出欧盟的表面原因。更深的原因在于，欧盟在运行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重大的结构性缺陷，如果英国继续与其深入融合下去，那么英国的主权、竞争力以及一些传统和民族特性都会受到重大的影响。

就拿欧盟最大的成就欧元区来说，就足以让英国保持警惕。欧元区的危机2009年底爆发至今已三年过去了。从2012年下半年开始，欧元逐渐走强，欧元区的几个重债国的国债收益率逐渐回归到7%以下，逐渐具有了自我融资的能力。因此，一些人就认为欧元区已经转危为安了。其实，欧元区债务形势的暂时稳定，是危机阶段性的表现，欧元区的危机根本就没有解决，只不过是靠欧盟的大力救助而暂时止血而已，加上现在只不过是人们被欧元区危机弄得麻木了，所以产生危机已经过去的感觉。其实，导致欧元区发生危机的根本原因一个都没有解决。欧元区的痼疾之一，是统一货币无法解决各国的差异性问题。欧元的币值相当于欧元区诸国币值的加权平均，那么自然德国获益，边缘小国遭殃，欧元区启动以后，欧元区内的竞争力呈现马太效应。现在希腊、西班牙等失业率都到了25%左右，年轻人失业率已经超过50%。欧元区的马太效应问题，边缘国家的增长问题，这些问题一个都没有解决。

看到这些问题之后，一些欧元区的欧盟国家有上了“贼船”的感觉，但因为这些国家有历史上被大国欺压的教训，害怕退出欧元区进而也被赶出欧盟从而被欧洲抛弃，加上过去被误导加入欧元区的沉淀成本太高，所以只能无奈地留在欧元区里观望。这种情况，英国看得很清楚，加上目前德国经济强而英国经济弱，一些英国人对深度融入欧洲心怀畏惧甚至产生退欧思潮，就不奇怪了。

加上“退欧”从贸易角度看对英国损失可控，使得一些人更有底气对欧盟说“不”。目前英国对欧盟内部的贸易往往呈现逆差，而且逆差数额比对非欧盟的逆差数额还大。所以，与其说英国离不开欧盟，倒不如说欧盟离不开英国。即使英国离开欧盟，英国还可以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与欧盟国家进行贸易，并不会因此关上贸易大门。

当然不是说英国退出欧元区一定是收益大于损失，或者损失微不足道。比如目前欧洲正在加强对于金融业的监管，如果英国退出欧盟，那么英国金融业与欧洲大陆的联系将会受到牵制，英国金融影响力可能下降。同时，英国退出欧盟，也会让英国作为美国与欧洲大陆的联系人的地位下降。所以，反对英国退出欧盟的声音也不小。

对于英国来说，欧盟实际上是个“鸡肋”。英国对于与欧盟的关系，实际上有三个选择：第一是退出，第二是深度融入即加入欧元区，第三就是保持现状，既不加入欧元区又留在欧盟内。第一个选择会造成损失，得失难以精确衡量。第二个选择无异于“自戕”，只有第三个选择看起来是最理性的。如果留在欧盟内部而不加入欧元区，那么，英国可以继续享受在欧盟内的超然独立的地位，利用重大决策和政策必须“一致同意”的规则，维护英国的主权和利益，并且与欧盟其他大国谈判，推动欧盟的改革。在未来若干年，英国留在欧盟以内，可以就福利问题、财政问题、金融业监管问题，与其他大国谈判，以解决目前的欧洲结构性问题和竞争力问题。同时，可以就欧元区的加入与退出、欧盟的加入和退出等问题，推动欧盟和欧元区出台一些改善性的制度，以解决欧盟和欧元区目前这种能进难出的陷坑式的机制安排。

所以，留在欧盟内部并且独立于欧元区之外，是英国损失最小收益最大的选择，更是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安排。如果未来欧元区的结构问题和竞争力问题完美解决，而且加入和退出的通道双向打通的话，英国可以选择加入欧元区；如果未来欧元区和欧盟的结构性问题无解的话，英国再退出欧盟也不迟。重要的是，英国留在欧盟并独立于欧元区之外，可以成为促进打通双向通道和欧盟、欧元区结构性改革的一个重要力量。

（作者单位：东航国际金融公司）

官员公开财产何必等通知

晏扬

广东省又有一名市长愿意公开自己的财产——继广州市市长陈建华、佛山市市长刘悦伦表示“如果有要求，我将公开财产”之后，深圳市市长许勤日前表示，如果有通知他也愿意公布财产。他还说，官员财产公开是廉政工作的方向，深圳市会根据国家和省委、省政府的要求，积极配合推进这项工作。

官员争先恐后表示愿意公开财产。此情此景无疑让人欣慰，这说明官员财产公开的重要性、必要性已逐渐成为官民共识，所谓公开财产“侵犯官员隐私”、“影响社会稳定”之类的谬论正失去市场；这还说明，尽管推进官员财产公开存在很大阻力，但支持的力量从来都是存在的，而且越来越强大，这种力量既来自民间，也来自官方内部。并非每一个官员的财产都见不得阳光，很多官员愿意公开财产以自证清白、取信于民并以此约束手中的权力。

然而，诸多官员表示“愿意公开财产”都有一个共同前提，那就是等上级提要求、发通知——为什么非要等上级通知呢？为什么不能主动公开财产呢？

首先，官员主动公开财产既不违法也不违规，相反，官员财产公开完全符合中央的意图。现行官员财产申报可以看作官员财产公开制度的雏形，尽管两者方式不同，但目的完全一致，那就是防止权力滥用、纯洁干部队伍，因此，对于此前各地试行官员财产公开，中央层面一直持默许态度。事实上，早在2009年2月，温家宝总理在与网友交流时就表示，正在积极准备对官员财产收入实行公开，并认为这是反腐败的一项重大举措。对于反腐败，中央的态度一向明确而坚决，习近平总书记前不久指出，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正如媒体评论所言，官员财产公开就是一只现成的笼子，官员何不主动将手中权力关进这只笼子？

其次，官员是人民的公仆，要遵从人民的意愿，依照人民的意志行事。上级的要求、通知官员们要照办，对于人民的要求和“通知”，官员们同样不能漠视。民间呼吁官员公开财产已久，声音一浪高过一浪，这方面的民众意愿高度一致。既然“主人”早已要求公仆们公开财产，公仆们早已收到人民的“通知”，为何不能主动公开财产，而非要等上级再提要求、发通知呢？这显然是一种“唯上”思维，在上级强令下才“愿意公开财产”，显得诚意不足，继而让人怀疑这样的回应是不是拿上级做挡箭牌。

再次，谁是上级？对于县，市是上级，对于市，省是上级，对于省，中央是上级。也就是说，相对于区县，广州市、深圳市、佛山市本就是上级，作为上级，完全可以提要求、发通知，要求在全市范围内推行官员财产公开，而不必非得等省委、省政府乃至中央提要求。任何改革，自上而下推行是一种办法，自下而上、由点带面推行也是一种办法。改革需要先行者，改革先行者需要有“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尚我看齐”的风范以及“为民请命”的责任担当，而最让人担心的就是相互观望、裹足不前，错过改革时机，让民众一次次失望。在这个意义上，希望有关官员财产公开的“上级通知”能够尽快下达。

■舆情时评 First Response

对决茅台走势伤肝火 大佬们悠着点

付建利

贵州茅台的股价无论是涨还是跌，总是不缺新闻。近日，重仓贵州茅台的知名私募大佬但斌和深圳光孚投资公司投资总监黄生在微博上掐架，言语激烈，甚至上升到人身攻击的层面。撇开对与错，如果职业投资人坚持自己投资的逻辑和信念，自己默默坚持就是，一则犯不着公开对决，二则完全没有必要进行人身攻击。这个世界上，观点分歧永远存在，真正的投资大师，比如巴菲特、索罗斯等，不仅在投资能力上堪称大师，在投资人品和涵养上也堪称表率。

黄生在新浪微博炮轰白酒股，并放言让但斌等典型的唱多白酒股的投资人士彻底噤声，因其成为中国股市版的“沧敦鲸”，该言论引发了但斌的强烈反弹，他在微博上多次发言力挺茅台，放言在茅台逆市大跌之际“言行一致！新增钱继续加仓买进”，并在某个回帖中写道：“如果政策允许，我愿意把持有的茅台股票（可以按香港及国际通行的借券融资最低成本的7%）借给黄生沽空，看看谁最后成王八，一年没结果，我们可以等十年！”

总结起来，看多茅台的人士最主要的逻辑无非是高端白酒具有刚性需求，而且茅台具有品质和品牌的护城河；看空者则认为塑化剂风波和反腐行动等会限制茅台的销量，白酒行业面临拐点。既然私募大佬们已经公开对决，就表明不怕公众围观与质疑，索性更进一步，把投资逻辑说得更清楚、更明白，比如公款消费对茅台的销量影响到底是几个百分点，这几个百分点的影响又是如何计算出来的？近期在茅台大跌之际到底买了多少，持仓能否公开？如果看空茅台，是否在做空，敢不敢把自己的账户给亮出来？既然都闹到微博上去了，如果私募大佬们一五一十地公开自己的持仓情况和更细致的投资逻辑，无论是唱多还是唱空，既可以证明自己“言行一致”，还可以摆脱为第三方利益服务的嫌疑。

巴菲特投资可口可乐、沃尔玛等牛股很早就是众所周知的事情，这些股票也曾经面对过各种非议，但我们没见过巴菲特和谁公开对决过，更没有进行过人身攻击，在看多或者看空某只股票时，你要么金口不开默默发财，或者独自咽下亏损的苦水；要么说就说透，以理服人，而不是大动肝火，或者霸气十足地让对方“彻底噤声”，或者出言不逊，以“王八”相称，这种动辄打棍子、扣帽子的做法，与现代社会对公民素质的起码要求不符，更不符合投资大佬的社会形象。

当投资大佬们因意见不合而大发雷霆、相互攻击时，明显情绪已经失控。投资是需要理性和冷静的，当这些非理性齐齐袭来时，大佬们，你们做任何投资决策，都要慎重啊！因为你们做每一个投资决策的背后，都牵涉着客户的利益。

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认为，不同的人在投资理念和具体决策上产生分歧，在股票市场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这也是股市成交能够进行下去的最主要原因，对待异见者，要么索性不予理会，要么平静地阐述自己的投资逻辑，如果一个市场的投资人动不动就火气十足地对待不同意见者，说明市场还有戾气，投资需要自信，但自信不等于戾气和跋扈。同样，优秀的投资家不仅需要超出常人的投资理念和投资能力，还需要优秀的投资风骨和投资气度！对于A股市场来说，这样的投资家不是多了，而是太少。

（作者系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观察员）

焦点评论

地铁逃票影响申请房贷

诚信系统在建立，上海举措有新意：
乘坐地铁若逃票，申请房贷将碰壁。
道德自律为辅助，制度严管是根基。
岂止金融需诚信，做人做事俱皈依。

ICLONG/漫画
孙勇/诗

货币超发冲击民生当反思

余丰慧

据媒体报道，2012年全球新增货币超26万亿元人民币，中国继续“巨量印钞”，新增广义货币（M_2）达12.26万亿元，在全球新增M_2中占比仍高达46.7%。

从存量看，截至2012年末全球货币供应量余额已超过人民币366万亿元，其中人民币占27%左右。从各国对比看，截至2012年末，中国M_2余额达到人民币97.42万亿元，居世界第一，是美国的1.5倍，比整个欧元区的货币供应量（约75.25万亿元人民币）多出不只一个英国全年的供应量。2008年，中国的M_2余额更是排不上全球前三，落后日本、美国，可见近几年中国货币存量增长之快。

造成人民币严重超发的原因主要是我国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导致的，具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大投资的经济拉动方式导致货币信贷疯狂投放，这是这几年货币超发的主要原因；二是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导致贸易顺差巨大，引起货币被动发行。

需要指出的是，人民币超发与美元、欧元和日元对本国带来的影响有很大区别。美元、欧元和日元是世界三大储备货币，它们放水冲击的是世界各个国家，买单的是全球各国。对本国有影响，但影响并不是太大，何况与国内生产总值（GDP）比较它们还不存在超发的情况。而人民币一旦严重超发可以说只能全部由国内百姓买单。人民币谈不上国际化，人民币几乎全部发行在国内。

人民币超发直接对民生造成严重打压，最大的受害者是国内百姓。我们可以通过计算人民币超发的具体程度来说明。截至2012年年末，中国的M_2/GDP达到1.88，创下新高。而同期美国的M_2余额为10.04万亿美元，截至2012年三季度，GDP为15.81万亿美元。这是什么概念？等于是中国一块钱的货币供应，只撬动了五毛钱的GDP，即只生产出五毛钱的商品价值（美国是一美元拉动最少1.5美元的GDP）。根据货币供应量等于商品总价值与货币流通速度之比的公式原理，即另外五毛钱的货币发行是没有商品保证和价值支撑的。如果货币总量的扩张节奏跟随实体经济同步变化，即M_2与GDP之比大致维持在1.5倍的水平，那么目前75万亿的货币总量就完全足够。但现在，货币总量已足足高出22万亿。这必然造成流动性溢出而对民生造成三大冲击：

首先，冲击物价。这几年物价直线上涨，一把青菜已经看不到一元以下一市斤的，通胀成为顽症久治不愈，给百姓生活带来巨大经济负担和压力。货币超发是凶手。

其次，推高房价。这几年房价直上云霄，买不起房、不能安居不但成为民生问题，而且成为经济和政治问题，然而，屡次调控却不能见效，不能勒住房价这匹野马，根源就在于人民币严重超发。

再次，偷走百姓财富和收入。这几年百姓一边货币收入增长，而另一边却感觉到购买的东西越来越少，货币工资的购买力越来越低。特别是随着贫富差距拉大，低收入者和收入增长缓慢的居民生活更显困难，货币超发其实是无形中剥夺和偷走百姓的收入，是他们生活愈来愈困难、压力越来越大的重要原因。

■书评 Book Review

“三个鸡蛋”上跳舞离不开资本市场关键作用

今天的中国经济正面临着转型的艰巨任务。经过30年高速增长，在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中国经济中一系列结构性矛盾开始凸显，急需解决。特别是在人均国民收入达到5000美元之后，要避免步拉美后尘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就必须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彻底转变。

2012年，中国政府首次将经济增长目标确定为7.5%，向世界发出清晰的转型信号。转型的号角已经吹响，转型的战争已经打响，在这场转型攻坚战中，如何发挥资本市场对经济转型助推器的角色，是全社会特别是资本市场监管者和参与者都在思考的问题。《未来十年——中国经济的转型与突破》一书，汇集了14位重量级的官员、专家、学者的专题演讲，是他们对中国经济转型和资本市场问题前瞻思考的成果。

在该书的序言中，中国证监会主席郭树清从多个维度分析了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这篇序言用“不改善金融结构，中国经济将没有出路”作标题，强调了健全和完善金融服务业体系的重要性。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面临的最主要结构性矛盾就是储蓄、投资和消费结构偏离常态以及与之相对应的经济产出结构失衡，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要素市场未能充分发挥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正如郭树清在书中分析“两多两难问题”（企业多，融资难；资金多，投资难）时指出的那样，这种悖论的深层次原因在于金融体系改革和资本市场建设滞后。

不仅经济失衡，我国金融体系自身也存在失衡：一是金融业内部结构失衡，融资体系高度依赖间接融资，直接融资比重过低；二是资本市场内部也存在结构失衡，债券市场严重滞后；三是面向实体经济的金融服务存在结构失衡。所以，不论是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发展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意产业、实现产业升级，还是完善社会保障，都需要更好地发挥资本市场的功能。

不仅如此，资本市场还有利于分散金融体系的内部风险，降低系统性危机发生的频率，减轻其不良后果。美国本来是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的中心，欧洲只是受到波及，但在3年后，美国经济的恢复却比欧洲要快得多。郭树清认为，金融体系结构的不同，是解释两者差别的一个重要原因。他还引用了国际货币基金的一项研究来说明这个问题。对历史上84次危机后17个经济体的恢复情况的综合研究显示，以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以直接金融为主导的经济体，复苏速度和质量远高于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等以银行为主导的经济体。这些研究成果，有力说明了直接金融相对于间接融资的比较优势。

十八大报告明确了“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加快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加快发展民营金融机构”、“完善金融监管，推进金融创新，提高银行、证券、保险等行业竞争力，维护金融稳定”等诸多对资本市场改革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工作部署。在该书中，郭主席对中国的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充满信心，“中国没有理由不成为世界一流的资本市场”。众所周知，郭树清两年前接任证监会主席一职以来，推出了一系列的资本市场新政，这些新政思路清晰，步骤稳妥。我们相信，这一系列新政都是为了最终建成世界一流资本市场这一远大目标的具体行动。

在该书中，证监会副主席姚刚对资本市场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了提纲挈领的阐述，让普通读者也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对监管层的资本市场发展思路有一个清晰的了解。证监会副主席姜洋则重点对中国衍生品市场的现状、问题和机遇进行了解剖，勾勒了中国衍生品市场未来的发展方向。证监会研究中心主任祁斌则把金融市场放在全球经济竞争的大背景下进行阐述，生动地揭示了金融市场在促进科技和产业对接融合中的作用。他形象地把今天的中国经济形势概括为在“三个鸡蛋”上跳舞——一个是经济增长，一个是预防通胀，一个是促进转型。应对这种高难度的挑战，唯一的办法就是加快经济社会转型的步伐，而中国金融改革和资本市场的发展，就可以成为未来十年中国经济转型的重要推手和突破口。

《未来十年——中国经济的转型与突破》一书主要内容由在北京大学举办的2012年资本市场实务系列讲座的演讲稿构成。该讲座除证监会官员外，还邀请了证券公司、基金公司、PE机构、外资银行等方面的负责人和专家。他们都是处于资本市场前沿的高端人物，演讲整体上高屋建瓴，深入浅出。此书的出版，为关心资本市场的年轻学子和金融从业人员开启了一个了解高端前沿思想的窗口。（谦石）

祁斌 主编
中信出版社